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方汉奇 主编

方汉奇 丁淦林 黄 瑚 杨雪梅

薛 飞 王润泽 编写
赵永华 赵云泽

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二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二版

方汉奇 主编

方汉奇 丁淦林 黄 瑚 杨雪梅
薛 飞 王润泽 赵永华 赵云泽 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0419-5

I. 中…

II. 方…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567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二版

方汉奇 主编

方汉奇 丁淦林 黄 瑚 杨雪梅 编写

薛 飞 王润泽 赵永华 赵云泽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印 张 31.25

字 数 62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P R E F A C E

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部“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是一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密切联系新闻传播工作的实际，广泛吸收新闻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高挹遐揽，取精用宏，供新世纪的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学使用的系列教材。

20 世纪初以来的 100 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 100 年。这 100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网络 and 多种新媒体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 100 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 100 年。其中最近的 30 年，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发展得尤为迅猛。据上个世纪末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即 1999 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 2 100 种，通讯社 2 家，广播电台 1 200 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 3 000 多座。其中，报纸年出版总数达到 195 亿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 88.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 89%，电视受众超过 9 亿。与

此同时，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总数也已超过 55 万。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势头更为迅猛。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数量在宏观调控下，虽无大变化，但软硬件的实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据 2008 年的最新统计数字，全国报纸的期发数已达 1.07 亿份，稳居世界第一位。全世界发行量最高的 100 家报纸中，中国占了 25 家（大陆 24 家，台湾 1 家）。电视受众超过了 12 亿，覆盖率达到 97.1%。宽带网的上网人数超过了 2.23 亿。手机的拥有量超过了 5.39 亿，手机短信的发送量超过 3 500 亿条。手机的功能已进入 3G 时代，由一般的通话，发展到手机短信、手机报和手机电视。与此同时，新闻传播业的产值也大大提高，超过了 5 440 亿元人民币，成为国民经济的第四大主导产业。中国在以上统计数据中的后几项数字，都已稳居世界的前列。

这样大的发展规模，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新闻传播事业在 21 世纪还将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新闻传播，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及各项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以及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必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这 100 年来，为中国的新闻战线培养和输送人才的中国新闻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中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上个世纪初，迄今有近 90 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的 30 年，虽然先后在个别院校中设立了新闻系或新闻专科，但规模都不大，设备也不够完善，在校学生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不超过 400 人，30 年间累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还不到 3 000 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人才，新闻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止，全国的新闻教育机构也还只有 14 家。当时全国只有 343 家报社、78 座广播电台和 13 家电视台，革命老区来的新闻工作骨干，正当盛年，足以支撑大局，新闻系和新闻专业的学生统招统分，基本上能够满足中央和省市以上新闻单位梯队建设方面的需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新闻事业进入低谷，新闻人才的培养也被迫中辍。拨乱反正之后，新闻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新闻工作的人才却出现了断层，明显供不应求。中国的新闻教育得以重整旗鼓并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间的事情。这 30 年来，中国新闻教育和中国新闻事业同步发展。截至 1999 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类院、系、专业的高校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两三所增加到 60 所以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专业教学点已不下 600 个。新闻专业的教学已从单一的大学本科教育，发展到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成人教育、函授教育等多层次的格局，个别院系还设置了新闻传播学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在校的新闻系科学生总共只有 500 来人，现在仅本科生就有 6 000 人，加上大专生和研究生接近 10 000 人。30 年间累计向新闻单位输送的毕业生超过 30 000 人。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

的加速发展和新闻战线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的新闻教育还将会有更大幅度的发展。

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很好的例子。两书都是作者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史教学时作为教材编写出来的,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推崇,几十年来一再重版,历久不衰,至今仍然是公认的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史方面的传世之作和经典之作。正因为这样,新闻教育的前辈们,历来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来年,坊间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教材。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研究空前繁荣,新闻学方面的书籍大量问世,但教材仍然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教材,覆盖了新闻传播学的方方面面,经过出版家和众多作者们的长期努力,门类和品种基本配套齐全,曾经为同时期的新闻教学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闻工作实际的飞速发展,这些教材的体例日显陈旧,观点和内容也亟待调整和更新。一些属于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开课程的教材尚付阙如,使现有的教材出现了不少缺口。在新世纪已经到来之际,积聚力量,重新编写出一套体系完整,门类齐全,能够为新世纪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人才培养服务的新闻传播学的系列教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和新闻业界及新闻教育界的迫切需求。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应这样的需求产生的一套系列教材,它将涵盖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满足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媒体经济、多媒体等多个专业的教学需要。负责这些教材编写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多所著名院校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学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编写者,都是相关学科的国家级学术带头人,堪称一时之选。收入本系列的教材,既有国家级的重点教材,也有部级的重点教材,其他的也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精品,所以,它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它们的权威性也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二是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新闻传播学作为将这两大领域有机联结的桥梁,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隆重推出这套系列教材,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在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和全体作者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部系列教材开始策划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本世纪初起陆续问世，迄今已编写出版了近 50 种。在体例和内容的创新和开拓等方面，远远超过同时期出版的同类教材。其中的有些教材，还根据整个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陆续做了必要的补充和修订，重新出版，实现了内容的与时俱进。

21 世纪，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都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批系列教材的问世，将会为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新世纪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这是出版者和全体作者共同的一点希望。是为序。

方汉奇

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08 年 7 月 20 日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1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溯源
6	第二节 唐代的新闻传播与早期的官报
10	第三节 宋代官办的“邸报”和流行于民间的“小报”
18	第四节 元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20	第五节 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
30	第六节 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40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40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
45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澳门、广州的近代报刊
50	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近代报业在香港的兴起
54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报业的崛起
62	第五节 在华外报网的形成与外报的历史作用
71	第三章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71	第一节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
83	第二节 维新运动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
96	第三节 维新派报刊的业务特点与历史作用

100	第四章 清末时期的新闻事业
100	第一节 资产阶级各政治派系在海外、港澳的报刊活动
115	第二节 “新政”与国内新闻事业的发展
128	第三节 新闻思想与新闻业务的发展
135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135	第一节 民国初年政党报纸的繁荣
141	第二节 袁世凯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47	第三节 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新闻事业
152	第四节 新闻业务的变迁和著名采访记者的诞生
161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61	第一节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68	第二节 新的报刊宣传阵线的形成
172	第三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76	第四节 新闻工作改革、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
181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18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
186	第二节 国共合作后的新闻事业
192	第三节 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新闻事业
197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中的革命报刊
200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200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207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212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223	第四节 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228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28	第一节 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240	第二节 国统区新闻事业与境外抗日宣传活动
248	第三节 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261	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61	第一节 国民党新闻统制的重建与新闻界的抗争
278	第二节 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工作中 两条战线的斗争
288	第三节 中国新闻事业的划时代巨变
296	第十一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
296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305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的探索和改进
313	第三节 新闻宣传报道的成就与过失
320	第四节 1956 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331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331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与调整
339	第二节 从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运动的新闻事业
348	第三节 60 年代初期新闻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353	第四节 主要新闻思想评价
357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357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艰难发展
364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
372	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闻传播事业
372	第一节 回归新闻本位——1978 年至 1992 年的新闻事业
393	第二节 驶上市场化的快车道——1992 年至 2002 年的新闻事业
404	第三节 日渐开放的新闻事业——2003 年至 2008 年的新闻事业
425	第四节 三十年的广播电视事业
444	第十五章 网络媒体迈向主流媒体
444	第一节 网络传媒格局的形成
449	第二节 网络媒体舆论影响力日增
456	第十六章 1949 年以来台湾、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
456	第一节 1949 年以来台湾的新闻事业
469	第二节 香港的新闻传播事业

479	第三节 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
484	参考书目
487	后记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CHAPTER 1

章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溯源

一、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

传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远古的人们结群而居，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有了信息，需要互相沟通，因此也就有了传播活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使用过的经过加工的海蚶壳，青海民和县阳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制喇叭筒，都是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进行社交和传播活动的物证。

古代的传播手段是十分原始的。最早的和最常用的是口头传播，即口耳之间的传播。谣谚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传播，受交通条件的限制，难以做到无远弗届，也经常因为传闻异辞而失实。在有文字以前，作为口头传播的辅助手段的，还有结绳、图画、雕刻、标识、烽烟、旗鼓等。其中的最后两项，通常用于军事目的。烽烟主要用于报警，《史记·魏公子传》和《史记·周本纪》中就有信陵君和周幽王

使用烽烟报警的记载。旗鼓主要用于指挥进退。《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指的就是这种旗鼓，旨在用它们来传递军事号令。

中国古代的传播活动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媒介，就是木铎。这是别的国家的传播史上所没有的。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尚书·夏书》称：“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据杜预注：“道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循于路，求路谣之言也。”据说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曾经有这样一种被称为道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这些都与新闻的发布和采集活动相近。前人之所以一度把木铎当做新闻事业的象征，近代的个别报纸还曾经以“木铎”作为自己的注册商标，就是这个缘故。

以上这些传播活动，大多见于文字出现以前。有了文字以后，古代的传播活动渠道更多，手段也更为多样化。

最早的带有文字的传播载体是甲骨和金石。甲骨文大多刻在龟甲或牛羊的肩胛骨上。据古文字学专家统计，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带有文字的甲骨近11万片，其中常见的甲骨文约2000字，经考订可辨识的仅1400余字。记载的大多是殷商时期的事情。所谓的金，主要指铜器。刻铸在铜器上的文字，通称金文。金文刻铸之风盛行于周，传世的带有金文的铜器铸件，多为周代的产物，著名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就是其中的代表，上面都有不少金文。在岩石上刻字，主要盛行于周以后。上述的这些传播载体，从内容来看，甲骨除少量纪事外，多用于祭祀和占卜；金器多用于记录帝王诏书或国家常法；岩刻多用于颂德和纪功。垂之久远和传于后世的考虑较多，现实的传播作用和传播的时效性还不算太大。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处士横议。各个地区性小国的统治者们需要发布政令，通报政情军情；参与合纵连横活动的政客们，需要游说诸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百家们需要聚徒讲学，弘扬自己的学说；老百姓们需要在公众场所聚会议事和交换意见；加上各国都设有驿站和传舍，以方便信使往来，及时递送信息，传播活动因而更为频繁。

《墨子·明鬼》中所记的“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弔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之，远者莫不闻”。《吕氏春秋·节葬》中所记的“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奸人闻之，传以相告”。《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所记的“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公闻其期”。《左传·晋城濮之战》中所记的“卫侯闻楚师败”等。这些都是有关这一时期信息传播活动的记载。其中所传播的有政情有军情，也有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是最新的信息。因此，也都可以算是早期的广义的新闻传播。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由于采取了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

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为社会传播的畅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值得提出的是,早在3 000年以前的上古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集市贸易,同时也就产生了最初的商业广告。《诗经·周颂·有瞽》有云“箫管备举”,据郑玄注:“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楚辞·天问》中有“师望在肆……鼓刀扬声”的描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高”的记述。这些都是有关口头广告、音响广告和悬帜广告的记载,属于早期的带有一定商业性质的传播活动。

正因为古代的中国有着频繁的传播活动,因此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传播活动的记载。而且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不少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事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保存至今的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纵横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就有不少关于传播功能、传播效果、传播心理、传播技巧、传播道德乃至受众需求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播学的研究并不完全起始于西方,中国也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发祥地。

二、两汉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传播活动

汉代以后,邮驿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每30里设驿,驿各有传,传置车,称传车,负责官文书和信息的传递工作。首都长安设有供地方官员和周边属国“通奏报,待朝宿”的“邸”。中央政府部门设有负责接待和通报工作的主官“大鸿胪”和属官“郡邸长丞”。此外,还设“公车司马令”一人,“主受章奏”;设“御史”若干人,充当皇帝的秘书,负责接受官员们的报告和皇帝诏书的制颁等事宜。封建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体制日趋完善。

面向全国臣民的政令发布工作,也日趋经常化和规范化。《史记·高祖本纪》有关汉高祖入关前和百姓们“约法三章”的记载,《汉书·萧何传》有关汉武帝元狩中“下诏御史,以酈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酈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的记载,都说明这类将法令和皇帝的诏旨公之于众广而告之的官方传播活动,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

两汉时代已经进入了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期。文字传播的载体,早期以竹和木制造的简和绢帛为主,有关的信息直接用笔墨书写在竹简、木简或绢帛上。造纸术发明以后,才逐渐发展到写在纸上。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也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西汉中后期,完善于东汉和帝元兴年间,完善后制造出来的纸,时称“蔡侯纸”。它的发明人蔡伦,并不是第一个试验造纸的人,而是早期造纸术由探索到完善的集大成者。由于造纸术当时还处在草创的阶段,掌握技术的工匠还不够多,产量还不够高,使用还不够普及,两汉时代的传播载体,仍以竹简、木简和绢帛为主。

汉代是否已经出现了类似唐以后的“邸报”一类的官报?目前在新闻史研究工

作者中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日本学者楚人冠、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密斯都有过中国“邸报”起始于汉朝的说法，但没有提出什么论据。中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在他的名著《中国报学史》中首先提出了“汉有邸报”的说法，但说得不十分肯定，后来在一些学术演讲中才逐渐趋向于肯定。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汉已经有了唐以后负责发行“邸报”的“邸”，二是《汉书》中有燕王旦在封地获知首都御林军调动情况的记载，推测燕王旦有可能是从当时的“邸报”上得到了这一消息。当代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中，也有一些人支持汉朝已有官报的说法。代表人物是姚福申和张涛。他们对近年在居延烽燧遗址和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抄录了不少皇帝的制书和大臣们的奏记，在这些制书和奏记中，有不少来自朝廷的涉及国内政治军事方面情况的信息。由此认为这些简牍具有官报的性质。张涛称之为“木简报”，但多数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仍然认为汉代还没有建立发布官报的体制。汉代的“邸”，还不具备发布官报的职能。汉代的文献资料中，迄今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邸报”的记载。上述的简牍，具有更多的官文书的性质。

三国魏晋时代历时近两百年，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时局纷争扰攘，居民辗转流徙，“国”际间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交往错综复杂的时代，也是新闻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和社会舆情十分活跃和旺盛发达的时代。

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的政治家们，都十分重视新闻传播，都具有比较强烈的信息需求，都十分关注对方辖区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事变动情况等方面的动态，都十分注意搜集敌友我三方的相关新闻和情报。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消息”一词，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使用。据尹韵公在《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一文中所作的统计，仅《三国志》一书中，就有近20段提到“消息”一词的文字。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也包括社会舆论对时局趋向和动态的议论和分析。在三国时代，信息的有无和正确与否，往往能够决定战役的成败。曹操在官渡之战、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之所以能取胜，和他们事先掌握了大量对方的信息有关。

为了能及时地获得信息和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魏蜀吴三国的驿传活动都深受当局的重视。刘备为了伐魏和伐吴，曾在成都到汉中和成都经白帝到夷陵一线修了不少驿站。孙权为了联蜀伐魏，也在境内广设驿站，史称“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集”。三国中，以曹魏的驿传制度最为周全，曾经在境内建立起一个四通八达的驿传网络，并专门制定过一个称为《邮驿令》的单行法。曹魏境内的驿传速度，可以达到一日300公里，并设有一种用双马牵引的称为“急锋车”的轻便小车，来急召军政要员和传递重要的信息。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布告和露布。布告就是《三国志》和《三国会要》中所经常提到的用以“布告天下”的那种政府文告，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和各级政府制颁的行政法令，以在固定地点悬挂或张贴为主。露布则是一种以

流动的方式“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的传播载体，主要用帛，也有用木板的，因此也被称为露板。内容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特别是用来传播战争胜利的消息。如封演在《封氏闻见录》卷四中所说的：“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但有的时候也用来发布政治性的檄文。檄文这种文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过，通常用来张扬和炫耀自己，打击和声讨对方。三国时代经常用它来配合军事行动，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先声夺人，“传檄而定”。魏晋到南北朝这一段时期，露布仍然是主要的传播媒体。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载“晋代桓温北伐，须露布文，唤袁宏。宏倚马濡染不辍笔，俄得七纸”。又说：“后魏每征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帛建于漆竿之上，名曰露布。”前一段文字，讲的是晋朝的事情，后一段文字，讲的是南北朝的事情。说明露布的运用在当时仍然十分普遍。其中有关袁宏的那一段故事，后来还被概括为“倚马可待”这样一个成语，用以形容行文的敏捷。从上述引文看，袁宏所起草的准备转录到露布上的那篇文字，就是一篇政治性的檄文。

为了及时传递军事信息，烽燧这种传统的报警手段，继续被沿用，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魏为了防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武装的侵扰，曾经在凉州地区广泛建筑烽火台，使有关的信息能够及时传到指挥机关。孙吴为了防备魏国的入侵，曾经沿长江每15公里至25公里设置烽火台达数千里之遥，传递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据《三国志·孙权传》称：“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又称：“暮举火于西陵（今湖北宜昌），鼓三，竟达吴郡南沙（今江苏常熟）。”宜昌到常熟相距一千多公里，三通鼓罢，就能把信息传到。在现代化的电讯交通手段发明以前，能有这样高的传播效率和速度，是十分令人惊叹的。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社会上传播手段被普遍采用的则有童谣和谣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情和民心的向背，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后者在当时又被称伪言、妖言或诽谤，往往出自政治上的敌对方面，因此往往遭到当局的严厉查禁。

三国魏晋时代传播信息的载体，是多元化的。既有包括木简、竹简、木牍在内的简牍，也有帛和纸。从存世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看，三国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用于书写和传播信息的载体，最多的还是简牍，其次才是纸，最后是帛。这是因为帛是丝织品，成本最高，而纸由于当时掌握制造工艺的工匠还不够多，产品的数量一时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上的需要。直到公元403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以后，才开始了纸张传播载体中独占鳌头的历史。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所说的“竹帛废而纸大行，当在魏晋间矣”，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情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建立发行官报的体制。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国外的传播史研究者曾经有过“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在中国开始出现‘邸报’”的说法，但是没有举出任何根据，因而不足

取信。

第二节 唐代的新闻传播与早期的官报

一、早期政府官报的出现和唐代官报的发行制度

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

唐代官报的孕育和发展，是从唐代中期开始的，是和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代中叶以后，开始在一些边远地区建立藩镇，设置节度使，到了9世纪初叶，全国节度使已经发展到40几个。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开始称邸，后改称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后，又改称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有时也被简称为留邸或邸。进奏院的负责人最初叫上都邸务留后使，后改称上都知进奏官，简称进奏官。有时也被社会上泛称为邸使或邸吏。唐代的进奏官是由地方派遣的，因此只对派遣他们的藩镇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的管辖。这些进奏官们既为所代表的地方藩镇呈递章奏，接受和代转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需要和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及时地向地方通报他们所搜集到的来自首都的各项朝廷政治消息。

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及书面报告，就是最早的官报的雏形。这种雏形状态的官报，在当时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有称为“进奏院状”的，见《李义山文集》卷一《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有称为“状报”的，见刘禹锡代杜佑作的《谢男师损等官表》；有称为“报状”的，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七《论幽州事宜状》；有称为“上都留后状”的，见田神玉的《谢兄神功于京兆府界择葬地表》；有称为“留邸状报”的，见孟棨《本事诗》所记有关韩翃被贺除官的故事；有称为“邸吏状”的，见《旧唐书·李师古传》；有称为“报”的，见杜牧《樊川集》卷十二《与友人论谏书》。所有这些名目，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即由长驻首都的进奏官们传发到地方的信息载体，其性质接近于宋朝以后的“邸报”。

需要指出的是“状”、“报状”、“状报”等这些称呼，在当时也被用来泛指某些官文书，报状有时还被用来泛指私人书信。因此，不能把见于唐人文集中的所有的状、状报、报状都看成是“官报”，只有经由进奏官们向地方传发的那些状、状报和报状，才具有“官报”的性质。

经由进奏院传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皇帝的起居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任免事项，臣僚们的章奏和其他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信息。